

暹罗曼谷王朝时期的鸦片问题

沈燕清*

摘要：暹罗曼谷王朝在鸦片问题上施行的是一种比较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历代国王都试图限制乃至消除国内的鸦片吸食习惯；另一方面，暹罗政府又力图从鸦片销售中汲取税收。这种政策上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迄今为止毒品问题在泰国仍难以根除的原因所在。

关键词：暹罗 曼谷王朝 鸦片

[中图分类号] D7336.8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2479(2012)1-0057-05

An Analysis of Bangkok Dynasty's Opium Problem in Siam

Shen Yanqing

Abstract : Bangkok Dynasty's opium policy is a relatively self-contradictory one , on one hand , successive monarchs have tried to eliminate opium smoking habits of Thai people ; on the other hand , the Siamese government extracted considerable revenue from opium sales. This paradox , to a certain extent , explains the reason why the drug problem in Thailand so far is still difficult to eradicate.

Key words : Siam ; Bangkok Dynasty ; Opium

一、鸦片的传入与种植

最初，暹罗本土并不种植鸦片，生鸦片多从印度进口^①。早在拉玛一世时代，英国人就已经开始借助东印度公司向暹罗这个“遍地铺满黄金”的王国输送鸦片。虽然拉玛三世在1811年颁布第一份禁止在国内出售和消费鸦片的法令，1839年又宣布一道禁律，不准任何人购买和出售鸦片，违者将受到严厉的刑罚，但鸦片吸食的恶习仍无法得到遏制^②。1855年4月，拉玛四世被迫同英国签订了不平等条约——《鲍林条约》，该条约规定，从英国输入暹罗的商品和从暹罗输出到英国领土的商品的征税都不能超过市场价格的3%。此外，英国输入暹罗的鸦片可免税，而这种鸦片输入后就卖给暹罗当局授权经营鸦片贸易的包税商人^③。《鲍林条约》的签订不仅严重损害泰国主权，结束了王室长期对贸易的垄断，同时也打开了泰国紧锁的大门。不仅泰国的资

源成为英国人掠夺的目标，鸦片大规模的种植与贸易也在泰国开始了。

一方面，英国鸦片开始大量涌入暹罗。在20世纪前20年，暹罗政府主要通过参加加尔各答的鸦片拍卖从英属印度进口生鸦片。从1918年开始，鸦片进口通过两国政府之间的双边协议进行。此外，还有少量的鸦片从中国云南省进口，但这种进口在1922年停止^④。

※ 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博士研究生

① Hamilton Wright , "The International Opium Commission"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Vol.2. , No3 Jul. , 1909. pp.667.

② (美)G·W·史金纳著，魏嵩寿、林俊绵译：《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南洋资料译丛》1964年第1期，第135页。

③ (苏联)尼瓦烈勃里科娃著，王易今等译：《泰国近代史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年版，第215~216页。

④ Bertil Lintner , "The Golden Triangle Opium Trade : An Overview" , Chiang Mai , March 2000 <http://www.asiapacificms.com>.

表1 暹罗20世纪初从英属殖民地进口鸦片表

1911~1912 年	1270 箱
1912~1913 年	1775 箱
1913~1914 年	1186 箱
1914~1915 年	2000 箱
1915~1916 年	2000 箱
1916~1917 年	1100 箱
1917~1918 年	1850箱

资料来源 Ellen N. La Motte, "The Opium Monopoly", <http://www.druglibrary.org/schaffer/history/om/om6.htm>.

同时,暹罗零售鸦片商店的数量也不断增加:1912~1913 年为 2985 间;1913~1914 年为 3075 间;1914~1915 年为 3132 间;1915~1916 年为 3104 间;1916~1917 年 3111 间^①,而鸦片成瘾者人数到 1921 年达到 20 万^②。

另一方面,暹罗也于 19 世纪中期以后开始了自己的鸦片种植。之后,罂粟种植由泰国北部地区的山地部落少数民族进行,这些民族包括苗、瑶、傈僳、拉祜、阿卡、克伦、克钦等 20 多个少数民族及其支系,大多从中国、缅甸、老挝、越南迁徙而来。其中,最早进入泰国的有 16 世纪开始从湄公河东岸迁入泰东北地区的老族和 300 多年前从缅甸迁入泰北地区的克伦人。19 世纪中叶以后,苗族也从老挝迁入泰国。19 世纪 80 年代,大量的山地高棉人以及苗、瑶、拉祜、阿卡、傈僳等民族又从缅甸、老挝、越南等近邻迁入泰国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这一移民潮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50 年代^③。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少数民族部落民的迁入,他们也带来了罂粟种植知识,并把这种知识和经验代代相传。每个收获季节,鸦片产品的一部分被留作家庭消费和礼节支出,在一些家庭中,这一部分支出达到鸦片总产量的 40%~70%,其余的将被用来作为产生现金收入的商品,为家庭提供食品和生活用品^④。直到 20 世纪初,在泰北与缅甸、老挝相邻的山区,鸦片的种植与交易成为一种支柱型产业,亦是政府重要的财政来源。

但是,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在泰北山区鸦片的种植早期蓬勃发展,但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前,整个金三角地区没有发展出大规模的鸦片生产,这是因为英属缅甸、法属印支以及泰国(暹罗)竭尽全力阻止各自山地部落种植鸦片,它们倾向于通过将政府掌控的鸦片出售给鸦片成瘾者来获取税收,而不是从生鸦片的生产和出口中获取税收。政府的垄断导

致鸦片价格不断提高,导致成瘾者转向黑市寻求鸦片,鸦片走私的猖獗迫使暹罗政府以及鸦片经销商花费巨大去进行边境巡逻,维持鸦片的较低价格以重新赢得客户。正是对鸦片走私问题的担心导致殖民地政府减少并限制这些山地部落的鸦片生产。殖民地官员认为,当地山区部落的罂粟种植面积将使走私扩大,因为(1)在山地巡逻的关口官员将发现无法区别合法的山地部落鸦片和走私来的云南鸦片;(2)山地部落将把鸦片转移到黑市,增加非法鸦片的供应并进一步减少政府的税入。这些问题影响了殖民政府对金三角地区的鸦片种植政策。因此,当中国南部和西部各省官员正积极推动罂粟种植时,金三角殖民地的官员要么限制要么积极地减少山地部落的鸦片生产。这种差异解释了金三角地区鸦片生产发展滞后的原因所在^⑤。因此,泰国本身的罂粟种植数量很少,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 40 年代^⑥。

二战期间,虽然泰国被切断其主要的鸦片供应,但它毫无困难地从其垄断中获得足够的生鸦片供应。同时,通过与日本帝国的军事同盟,泰国占领了缅甸东北部掸邦,取得了进入缅甸在沿中国边境的鸦片种植地区的通道。此外,战争减少了云南省对东南亚的鸦片出口。但是,走私鸦片的大篷车继续从云南穿越边境,为泰国吸食者提供大量的廉价鸦片。因此,泰国在二战中完好无损地保留了其大量成瘾者群体及对进口鸦片的依赖^⑦。

二、曼谷王朝的鸦片税收政策

暹罗曼谷王朝对鸦片实行的是一种比较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对鸦片实行政府垄断政策,从中取得大

① Ellen N. La Motte, "The Opium Monopoly" <http://www.druglibrary.org/schaffer/history/om/om6.htm>.

②⑥ Bertil Lintner, "The Golden Triangle Opium Trade: An Overview", Chiang Mai, March 2000 <http://www.asiapacificms.com>.

③赵永胜:《泰北山地民族文化的变迁与延续》,《东南亚南亚研究》2009 年第 3 期,第 80 页。

④《Learn More about Opium Poppy Cultivating Situation in Thailand》<http://www.aspacngo.org/uploads/events/jamming/eng1.pdf>.

⑤⑦ Alfred W. McCoy, *The Politics of Heroin in Southeast Asia*, Harper Colophon Books, Harper & Row Publishers, New York, Hagerstown, San Francisco, London, 1972, pp.64~65, pp.68~69.

量税收,另一方面又企图控制乃至消除鸦片消费。

最初,曼谷政府对鸦片施行包税制度(opium Farm)。鸦片包税指鸦片销售的垄断特许权,通常这样一种垄断由政府提供给一个特权许可人,或一个“包税者”,在一段有限的时间内,它适用于一个严格划定的领域——一个城市,一个地区,一个省^①。在鸦片包税制度下,政府是鸦片的唯一进口者,无论是生鸦片还是鸦片成品,并将它以一个固定的价格销售给鸦片包税者,包税者将根据当地的口味对鸦片进行改造,并将其出售给消费者^②。暹罗曼谷王朝的鸦片包税制度是拉玛四世在1852年创立的,并由于《鲍林条约》(the Bowring Treaty)得到加强。因为根据1855年的《鲍林条约》,英国对泰国王室施加了诸多限制,所有的泰国皇家贸易垄断被废除,进出口关税也被定得非常低,因此就增加了国王对其他税收来源的依赖,最主要的是赌博包税与鸦片包税^③。根据《鲍林条约》,鸦片可以不抽税但必须出售给鸦片包税人(华人)。鸦片包税人向政府购买包税权,实际上就是把他所能直接征收到的税款付给政府,而买得独家进口鸦片和在地方上加工和零售鸦片的权利^④。在曼谷王朝时期,鸦片承包税为暹罗财政作出过重要贡献。1874年鸦片承包税的价格大约相当于100000英镑,在1891年上升为136000英镑^⑤。1901~1902年暹罗鸦片包税产生500万铢,占政府总收入的25%左右^⑥。1903/1904年度,国家从鸦片承包税中得到的年收入在700万铢以上,1905/1906年度在1000万铢以上,总计占政府总收入的15%~20%之间^⑦。

1907年以后,暹罗政府废除了鸦片包税制度,转而实行鸦片局制度(Opium Regie),这是朱拉隆功国王(即拉玛五世)广泛的行政改革的一部分。暹罗政府废除鸦片包税的主要考虑是:1.政府相信自己能够从接管鸦片垄断的行政管理中获得财政利益。2.政府认为,在包税者的行政管理下,鸦片垄断对消费者施加了一个沉重的负担。鸦片包税制度下,鸦片零售价格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每个鸦片包税的领域内有很多不同的中介利益,每个中介都寻求一定的利益点,而包税者设定鸦片零售价格时不遵守政府的规定。3.政府认为过去几年中暹罗经济发展的缓慢原因主要是鸦片包税者将盈利寄回中国,而不是在暹罗进行投资^⑧。因此,鸦片包税制度在1907年被终结,暹罗政府建立了所谓的“鸦片局”直接管理鸦片事务,政府现在自己处理鸦片的进口、加工和

批发,只有对成瘾者的鸦片成品的零售仍保留在鸦片零售权承包者的手中。这些改变导致鸦片销售税入的急剧增长,因为在包税制度下必须出让给承包商的利润现在被政府收回。“鸦片局”创立的标志是1908年9月21日朱拉隆功国王55岁生日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大篇幅地提及鸦片。他宣称,一个政府鸦片垄断的行政改革是与国王的愿望相符合的,即“不要忽视我们的人民,让他们因为沉湎于这个有毒的药物而更加堕落。”事实上,通过鸦片垄断,“我们的人民中的鸦片习惯的传播应该可以被逐渐减少,直到被完全压制”^⑨。此后,鸦片局为政府带来的税入迅速增长,1919~1920年来自鸦片的税入增加一倍以上,从大约1120万铢增加到超过2300万铢,占了政府全部税入的1/4以上^⑩。

1921年和1929年暹罗又公布鸦片法,限制鸦片的私有买卖^⑪。此后几十年间,政府从鸦片专卖中得到的收入仍是很高的。1955年泰国政府透露,政

① James R. Rush, *Opium to Java: Revenue Farming and Chinese Enterprise in Colonial Indonesia*,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1.

② Anne L. Foster, “Prohibition as Superiority Policing Opium in South-East Asia, 1898~1925” in *The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Vol. 22, NO.2 (Jun. 2000), pp.255~256.

③ John Butcher, “Revenue Farming and the Changing State in the Southeast Asia” in John Butcher and Howard Dick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in Great Britain, 1993, pp.29~30.

④⑦ (美)斯金纳、许华等译著:《泰国华人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28页。

⑤ 《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见《南洋资料译丛》1964年第1期,第135~136页。

⑥ Carl A. Trocki, “Drugs, Taxes and Chinese Capital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Timothy Brook and Bob Tadashi Wakabayashi eds., *Opium Regimes: China, Britain and Japan, 1839~1952*,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p.81~82.

⑧ Ian Brown, “The End of the Opium Farm in Siam, 1905~1907” in John Butcher and Howard Dick eds., *The rise and fall of revenue farming: business elites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modern state in Southeast Asia*, published by The Macmillan Press LTD, pp.242~243.

⑨⑩ “Siam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9~1946” pp.86~87 pp.88 <https://openaccess.leidenuniv.nl/bitstream/handle/1887/12395/Thesis.pdf?>

⑪ 杨建成主编:《南洋研究史料丛刊》第21集《泰国的华侨》,中国台北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印行,1986年版,第347~349页。

府每年从鸦片专利所得的收入约达 1.17 亿铢,其中出售鸦片给注册鸦片馆的款项占 6720 万铢,游标领取鸦片馆执照的收入占 4730 万铢。

三、受曼谷王朝逐步限制与禁止鸦片消费的政策

在积极从鸦片销售中汲取税入的同时,曼谷王朝历代国王都试图消除鸦片的危害。拉玛一世曾发布法令,禁止吸食和买卖鸦片,违者处以泅海水和蹲大牢的刑罚。然而,拉玛一世的法令没有起到令行禁止的效果。拉玛二世继位后,即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巡访调查,于公元 1811 年 9 月 14 日发布了一项禁令:“先王有立法,规定禁止任何人吸食和买卖鸦片,违者处以泅海水和蹲大牢的刑罚。然吸食鸦片者不守立法,致使先王盛怒,遗旨颁布法令,再次宣布禁烟。先王之心本为拯救众生,今日御令重申,从今以后,绝对禁止任何人吸食鸦片,违令者,将受鞭笞三顿,陆上游街示众三天、船上示众三天之刑罚,其妻儿及财产,还要全部查抄归官。知情不报者鞭笞 60 下之刑罚。”拉玛二世在颁布实施这一御令的同时,限令“凡在查禁之前购买的鸦片,须于规定期限内上缴官府,可不治罪”。官府将收缴来的鸦片,送到其他国家,换取银两充公备用^①。拉玛三世则发誓要让吸食鸦片的行为在暹罗彻底消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拉玛三世曾保证对戒烟者和将鸦片献与朝廷者免除治罪。当时,鸦片买卖落入华人手中,暹罗朝廷的损失越来越严重。贩卖鸦片的是当时被称为“红旗军”的华人地下黑帮,这个黑帮是在拉玛三世继位不久开始出现的。他们从英国商人那里购买印度鸦片,然后在暹罗转手卖出,其利润之大非其他商品可比。正因为买卖鸦片利润大,所以,“红旗军”内部也为抢买抢卖鸦片发生内讧,展开残酷无情的械斗,对暹罗百姓的安全造成危害。暹罗朝廷曾坚决地对其进行征剿^②。在征剿“红旗军”的同时,拉玛三世还在公元 1826 年 6 月 20 日签署的第一次《暹英条约》中明文规定:禁止向暹罗输入鸦片^③。公元 1840 年暹罗皇家舰队在曼谷河面查获一艘运输鸦片的中国商船,这在暹罗是绝对禁止的。当时正值中英鸦片战争爆发,两艘中国商船来自新加坡,船上的华人是英国人的“臣民”。为了避免与英国人发生剧烈矛盾,引起战争,当新加坡英方官员向拉玛三世作出表示之后,暹罗海军将商船释放,并监视其离开

暹罗领海^④。虽然迫于英国的压力,拉玛四世在 1852 年创立鸦片承包税制度,但他不忘采取措施使抽鸦片只局限于华人。他下令任何抽鸦片的泰人必须蓄辫子和缴纳华人三年一次的人头税,其理由是一个人染上华人的恶习,他就丧失了作为一个泰人的好身份的一切权利。因此,虽然当时暹罗有不少华工吸食鸦片,但泰人鲜有养成抽鸦片的习惯^⑤。拉玛五世在其统治后期逐渐废除关税和捐税的许多承包权,最终在 1907~1908 年度和 1908~1909 年度将鸦片贸易收归国有,并取消了鸦片承包税^⑥。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各国越来越多地寻找抑制或消除国际鸦片贸易和吸食鸦片习惯的方法,暹罗也积极地加入到其中。1909 年第一次国际鸦片会议在上海召开,暹罗接受了邀请,此次会议讨论了多边的鸦片贸易和与消费有关的问题,并探讨了逐步减少鸦片生产、贸易或消费的一些问题。由于各种原因,上海鸦片会议并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措施,但它是鸦片国际议程中的第一步,为第一项国际药物条约即海牙《国际鸦片公约》(1912 年)的拟订奠定了基础^⑦。在 1911 年年底,在海牙召开了第二次国际鸦片会议,有 11 个政府代表团参加,暹罗也在其中。1912 年 1 月签署了“海牙鸦片公约”,该公约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它声明彻底铲除吸食鸦片的长远目标,但是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海牙鸦片公约”的签字国只有少数几个,而暹罗则是早在 1913 年 7 月 10 日就批准该公约的国家之一^⑧。

20 世纪 30 年代是国际毒品控制的高峰期。正是在这个时期西方以及部分泰国精英对鸦片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鸦片不再被看作只是另一种可以交易和出售的商品,而是对个人和社会的一种潜

①②③④范军:《千古兴亡九朝事——泰国王室》,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年版,第 40 页,第 57 页,第 59 页,第 58 页。

⑤(美)斯金纳、许华等译著:《泰国华人社会:历史的分析》,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 128~130 页。

⑥(美)G·W·史金纳著,魏嵩寿、林俊绵译:《泰国华侨社会史的分析》,《南洋资料译丛》1964 年第 1 期,第 136 页。

⑦ The United Nations and Drug Abuse Control,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 sales No. E.92.1.31.

⑧ “Siam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9~1946”, pp.90~91, <https://openaccess.leidenuniv.nl/bitstream/handle/1887/12395/Thesis.pdf?>

在危害，而非医疗或非科学目的的鸦片贸易越来越被看作是不道德的、与现代社会格格不入的。暹罗积极参与到这一时期的历次国际鸦片会议中，如两次日内瓦会议和 1931 年的曼谷会议。

但是，由于鸦片构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暹罗在铲除鸦片问题上存在诸多犹豫。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国际联盟的工作开始时，泰国政府称不能没有来自鸦片的税入，因为其在 20 世纪与欧洲国家签订的类似于《鲍林条约》的不平等条约，进口货物只征收 3% 的税收。暹罗提交给国际联盟的年度鸦片报告不断重复这种论点，直到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暹罗提交给国际联盟的年度鸦片报告对曼谷政府而言是一个向欧洲政府施压的有用工具，以要求它们修改不平等条约，而这超出了国际鸦片控制的领域。而英国政府此时还不愿意放弃其在暹罗的治外法权。到 30 年代下半期，当新的国际条约提供给暹罗财政和关税自主权，暹罗政府就开始执行更严厉的鸦片控制政策，来自鸦片销售的税入相应减少。这个趋势一直持续到 40 年代中期，当时暹罗已实施抑制鸦片消费的大部分国际协议，并建立了一个鸦片进口和分销的控制制度，其国家的鸦片销售收入创下了历史新低。

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末情况又发生了逆转。由于国际上反鸦片运动的影响，从 1907 年起英国政府已经减少对中国的鸦片出口，在 1926 年则决定逐步废止所有用于非医疗目的鸦片出口，直到 1935 年^①。到 30 年代晚期，由于英国鸦片供应的限制以及全球合法鸦片生产的减少，暹罗合法进口足够数量的鸦片变得越来越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除了生鸦片的进口外，暹罗政府于 1938 年年底正式授权该国北部的鸦片生产实验，到 1940 年 3 月政府宣布该实验成功，并宣布将扩大鸦片生产；为了扩大这种生产，1941 年足以种植 16000 亩田地的大量罂粟种子从印度被进口^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鸦片种植迅速发展，政府来自鸦片销售的税入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该数字甚至使 20 年代的惊人的数字相形见绌^③。

二战期间，暹罗又恢复到将鸦片作为一个主要税收来源的做法。由于日本对东南亚的占领切断了暹罗的外来鸦片供应，暹罗北部的鸦片生产得到加强，因此，“在泰国大量廉价的鸦片继续被吸毒者使用意味着该国巨大的吸毒者人口在战争年代中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④。二战结束后，鸦片等毒品问题依然是泰国社会的顽疾。

①②③④ “Siam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1919~1946” pp.89~90 pp.125~126 pp.127~128 pp.128~129 <https://openaccess.leidenuniv.nl/bitstream/handle/1887/12395/Thesis.pdf?>